

禁止公布的文件

東方出版社

禁止公布的文件

捷共中央委员会下设小组委员会关于
1949年至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
政治审讯和平反工作的报告

伊日·贝利康撰写序言和后记

伍 仁 译

東方出版社

出版说明

捷克斯洛伐克从四十年代末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审讯，波及范围很广。在1951—1952年的所谓“斯兰斯基反党反国家阴谋中心案”这一重大案件中，十四名被告都是党政领导人或高级干部，连斯兰斯基共有十一人被判处死刑，其余三人被判无期徒刑。这些审讯的详情，官方一直未公布。

1968年4月，捷共中央决定专设一个由各方专家组成的小组委员会，负责关于政治审讯案件的调查与平反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本应在1968年底提交捷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由于八月苏军进入，该报告被归入捷共的绝密档案。起草报告的人也遭到严重迫害。后来有一批坚决反对苏军占领而被迫流亡国外的前捷共党员，把这份文件带到国外，先后译成德文、法文、英文和意大利文等文字出版。捷克文版是1970年7月在意大利问世的。

此书由流亡在意大利的捷反对派领导人之一伊日·贝利康主持出版，并撰写序言和后记。贝利康是前国际学联主席，曾任捷共中央委员。他是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事件的积极参加者，也是五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审讯的一个见证人；现已加入意大利国籍，为欧洲议会的议员。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1949年至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政

治审讯和平反工作的报告。报告分三大部分：政治审讯、审查和平反、政治责任；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与政治审讯有关的当时的国际背景、国内政治条件，政治审讯的原因、经过和造成的恶果；介绍了1955年至1962年复查和平反的情况；指出当时的捷共和国家领导人对审讯应负的责任。本书还附有两个文件：一是小组委员会主席皮勒尔准备在捷共中央委员会上做的报告的初稿，一是捷共中央委员会关于结束党的平反工作的决议草案。书末有详细的人物介绍。

本书对五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大规模政治审讯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有助于我们了解捷克斯洛伐克在1949年至1968年二十年中发生的政治事件、1968年苏军占领事件的由来以及苏联同东欧各党的关系等情况。现根据1970年捷克文版译出，以供研究参考。

捷克文版序言

我们将捷共中央委员会下设小组委员会关于政治审讯和平反工作的报告原文，就象已经用德文、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和其他语文发表的那样，向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读者们公布。如果说这本书在国外出版有许多困难和缺点，这这是由于与1968年8月20日的军事干涉在我国造成的不正常状况的后果有关。

公布这一报告的迫切性在于客观地查明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假象、恶意中伤、进行镇压和制造政治审讯的机器又开始运转了，甚至从1970年2月所谓的捷共新领导集团正式决定向党和公众隐瞒这个文件并销毁它这一事实来看，其结果也可以说是真正悲剧性的。

这个决定有着自己的逻辑。揭露过去的做法，包括过去政治审讯的文件，这就会打乱新的不公正和罪行的制造者们的计划，给他们小心翼翼地、隐蔽地准备进行报复造成了重重困难。

尽管一再肯定，将不再重现五十年代的变态，但除了大的政治审讯外，五十年代的变态现象实际上已更加普遍，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可是，所谓五十年代的变态恰恰不只是指那些从表面上看来达到顶点的政治审讯。那个年代的变态的实质是：拒绝和指责走向社会主义的本国道路，无保留

地接受斯大林的模式，通过把每一个不同的观点与“反对党的第二中心”联系起来、控告有主见的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与“外国的侦察机关”有联系，以及把对党的领导人的批评与“反共主义”等同起来，把对苏联领导集团的政策保留意见与“反苏主义”等同起来的办法，取消任何有创见的讨论。这一切作法目的是为了中伤、嘲弄、孤立，然后先从“政治上”、后从“肉体上”消灭对手，可是，对此又没有任何可能进行辩解。难道这些方法只是过去用过吗？

以开除人们的党籍和公职、解除国家职务和社会职务等方式进行的政治上的迫害和“清算”，对人们的控告和折磨，以及利用公共宣传工具循环不断地对人们进行的侮辱，就其规模来说，比1949年至1954年要大得多。

政治审讯心理上的准备基本上已经完成：每天都在公布关于实际上不存在的“反革命活动”的虚构材料；许多人都被揭发为“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第二中心”的代表（与1949年至1954年相比，只是少了“铁托主义”，而这已开始被“毛主义”所代替）。他们也不缺少必要的、象议员多赫纳洛娃、扬·斯沃博达、卡尔库斯、哈弗利切克和其他人在1970年5月27日人民议会的会议上所说的那种要求公正地惩罚“反革命势力”和“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来自下面的呼声”，而且这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因此，捷通社必须在不使公众知道这一点的情况下，根据党的领导集团的指示，检查了他们的发言稿。

然后在幕后，除了一次又一次作出的互相矛盾的保证外，还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国家安全机构把材料集中起来，

以便“正式地用文件的形式来记录和证实这一反革命活动”，就象内务部长在上述人民议会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他允许对那些已被监禁好几个月的人们，象卢杰克·帕赫曼、扬·特萨士、鲁道尔夫·巴捷克、彼得·乌赫尔和其他许多人进行审讯，也准备对那些暂时经过审问后获得自由的人们进行审讯。

同时，在安全部门、法院和相应的国家机构中进行大规模的清洗，这也是五十年代开始进行一系列审讯和迫害的条件。

动员国内外公众舆论和真知灼见，是唯一能够制止正在运转着的这部机器的主要阻力。所以，他们才对宣传工具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政治领导人进行这样的大迫害。这些人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敢于谈论这种镇压，因为他们相信，事实尽管是残酷的，但不会损害社会主义，而只会损害社会主义的掘墓人。所以，必须进行占领，并通过占领产生所谓捷共新的领导集团，以便能够再一次强奸真理、压制真理、掩盖真理和铲除真理。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今天必须出版捷共中央委员会下设小组委员会的《报告》。这并不能给我们任何安慰，我们也不把这理解为某种轰动一时的消息。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份特别重要的和客观的文件，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进步运动（我们感到这是自己的一生和自己今天斗争的牢固不变的组成部分）来说，暗含着多么惨痛的教训。这也并没有使我们象那些拥护占领的下流作家和全权代理人向人们大量宣传的那样，获得任何财务上的收益。为了获取官僚制度下的功名或者舒适的生活，或者由于恐惧，这些人早

已出卖了自己的理想。所以，他们甚至不能想象别人会按另外的方式考虑问题和行动。我们已把外文版的微薄的财务收入用于这一捷克文版的支出，不足部分由国外的同志们，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以及左派人士支付了。他们了解，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也涉及到他们的未来。

这是今天和1949年至1954年当时的局势之间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当时受审判和被诬陷的这些人，在国内和世界上，特别是在他们把自己的一生和信念都献给它的那个进步的世界里，是孤立的。今天的情况是有本质差别的。尽管有人顽固地和毫无顾忌地企图向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传播“正常化”，大多数共产党却一致谴责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不撤销自己的决定。在那些又逐步地屈从于今天苏联领导集团的路线的党内，正在产生着内部的分歧和反抗。进步的共产主义战士象恩斯特·菲尔舍尔、罗歇·加罗迪、沙尔·狄戎以及其他几百名不是反共主义者的人，也已不再沉默，并在共产党的队伍外开始为社会主义的复兴而斗争。青年人、大学生、工会组织、最优秀的艺术家、左派党和小组，以及一直对捷克斯洛伐克表示同情和声援的大部分世界公众舆论都支持他们。我们并不幻想我们是、并将永远是世界注意的中心，但事实是，对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的态度成了全世界进步运动中明确的因素，全世界进步运动为自由、进步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是与我们为恢复我国主权和回到一月以来的政策而进行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对全世界的千百万人来说，“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成了可替换“坦克社会主义”的抉择对象的象征。

我们出版的捷文版与意大利文、德文、英文和法文版在

形式上一样，尽管序言和结论写于1970年初，是为那些不了解一系列历史事实和背景的外国读者所写的。所以，读者自己会相信，我们公布于世界公众的这一份文件，在引用材料方面完全是客观的；至于说到小组委员会准备的报告，已经不是提交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因而也是没有经过批准的报告，其原因是非常清楚的。所以，1970年7月10日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发表声明，企图“证明”任何党的机关也没有批准中央委员会下设小组委员会的这一报告，完全是多余的。这点从一开始我们就肯定过。但是，在沉默了三个月之后才出现的捷通社的这一声明为我们帮了无法估量的大忙，这是因为在这里，官方的通讯社证明了，1968年捷共中央四月全会选出的小组委员会确实拟定了这个报告，并且据这个声明说，捷共中央主席团执行委员会——也就是党的最高机关讨论了这样一个报告。因此，捷通社使占领后的《红色权利报》主编米·莫茨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在不久前还企图把这个报告说成是“西方宣传的新捏造”，并把它与伪造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们的宣言看成一回事。

捷通社的声明还指出，据说“未来的（！）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古·胡萨克”和领导集团的其他成员，包括杨·皮勒尔也谴责了小组委员会的这个报告。这证明了我们的一个观点，不仅占领者们，而且特别要紧的是还有党的领导集团中的某些成员，对消除小组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很有兴趣，因为这个报告过去和现在都使他们感到非常不愉快，尤其是报告的结论部分。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杨·皮勒尔最先签发了这个报告，后来又否认这一报告，这点我们就让他凭自己的良心决断吧！在他之前，已经有几个领导人试图通过辱骂自己，

以及主要是通过诽谤别人，诽谤昨天的朋友和合作者来为自己参与一月以来的政策赎罪。当然，这也不能长久帮他们的忙。这些人首先失去了别人对他们的尊敬，后来也失去了自己的领导职务。忠诚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主义者象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弗朗齐歇克·克里格尔以及几十名、几百名和几千名一直忠于自己的信念和自己祖国的其他人，在这个问题上不知要比他们好多少倍。

所以，我们把这一文件和我们对此的想法献给所有这些光荣的人民和战士，1969年至1970年期间政治镇压的牺牲品，他们经历失败的战役后作为胜利者而在这一历史性的冲突中出现。如果说，为五十年代的牺牲者恢复名誉用了十至十五年的话，那么，恢复这些人的名誉连这一半的时间也不需要。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将互相问：您为此作了些什么？因为这次任何人也不能推托说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伊日·贝利康

1970年7月20日

序 言

我们将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另一个爆炸性的文件公布于众。这次公布的是一个关于政治审讯和结束平反工作的报告。一个专门的小组委员会根据1968年4月捷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拟定了这个报告。全会决定，以极端可靠的态度审查大规模政治审讯时期的非法事件，特别是捷共前总书记鲁·斯兰斯基案件，以及为什么安·诺沃提尼时期的前领导集团在大家已经知道审讯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之后，还长时期地阻挠平反的原因。

关于消除旧的不公正的这一决议，是捷克斯洛伐克一月以来全部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月以来的政策是以1968年1月将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的职务分开，并选举亚·杜布切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而开始的。1968年4月这次捷共中央全会上通过了捷共的《行动纲领》。该纲领是对自称为“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这一特别运动的要求和概念的第一个综合性的纲领性总结。

弄清政治审讯，为无辜的牺牲者平反，阐明政治审讯的原因并为类似的蜕化不再重演做出保证，这些要求理所当然地属于改革运动的首要要求。或者说，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同它以审讯所表现的那类变态为标志的实践之间的矛盾

盾，才造成了几年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经历的、并于1968年1月达到顶点的政治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

今天，在捷克斯洛伐克不准公布的这些文件——就象不准公布的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文件一样——能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过去二十年来，特别是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发生的事件，包括华沙条约五国武装干涉的原因。这不仅是由捷共中央委员会选举的小组委员会的工作成果，而且也是科学家们——历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被党邀请去进行合作的可靠的共产党员们的整个庞大集体工作的成果。

虽然有人可能指责这些文件在分析国际和国内事件时，尤其是分析1945年至1955年期间的事件时有些简单化，但这不是这个报告的主要任务。有实质意义的是，这一特别艰巨的工作的整个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它驳斥了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官方的新斯大林式宣传最喜爱的一个论点，即1968年1月至8月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发生了什么资产阶级性质的自由化，或者甚至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完全相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所肩负的任务与自己能胜任的能力来比可能太艰巨、太复杂了，虽然如此，但这完全是历史的必然：不仅要为无辜地受到审判的共产党人平反和废除不正确的判决（这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也进行过），而且也要分析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理想相矛盾的变态的原因，在制度本身中寻找它们，并提出保证，使将来不可能再重演类似的悲剧。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渴望通过这样做至少部分地促使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的任务得到解决。苏共第二

十次代表大会后，当时虽然敢于揭露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蜕化，但是没有对当时的条件进行真正的、科学的分析，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究竟为什么能发生这样的现象；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当时已经怎样正确地进行了批评；成千名共产党人、社会党人以及那些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抉择就是社会主义的人会有什么感想。因为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来说，把造成所有这些伤疤的责任推到已故的领袖，如克·哥特瓦尔德或者当时已经在政治上孤立、并已被撤职的前第一书记兼总统安·诺沃提尼身上，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可是，这并不符合捷克斯洛伐克发展的整个精神和改革努力的目的。这种努力的目的在于：把歪曲社会主义的东西清除掉，恢复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及其道德伦理上的尊严，使它完全具有人道主义面貌。（顺便说一下，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今天在捷克斯洛伐克，许多教条主义者还一直不停地对据说完全是多余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定语——“具有人道主义面貌”发怒。根据他们的说法，每一派社会主义都是人道的和民主的，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但是，我认为这一定语过去和现在都是非常重要的，并有着自己的深刻含义。因为社会主义虽然有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可是它与资产阶级社会相比，没有给人以更多的自由，甚至还允许把无罪的人判处死刑和监禁——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都取消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的内容。）

这些文件资料就象1968年春季期间的另一些文件一样，也驳斥了那些同情捷克斯洛伐克的这种努力的人们经常相信的、近来津津乐道的、广为流传的诽谤，即捷克斯洛伐克试验的想法虽然是好的，却是天真的、轻率的、没有一个明确

概念。尽管1968年1月开始爆发的整个运动的真正纲领在1968年春天的几个月份中才刚刚形成（因为在此以前由于个人权力制度，不可能集体制定出纲领性的文件），但它的主要思想几年来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中已经成熟了。在反对派和（在不同情况中表现出来、并有着变幻无常结果的）个人权力制度的领导人之间冲突的过程中，争得这一道路是困难的。恰恰在1968年1月，各种危机因素——经济衰退、与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冲突、主观主义的管理、世代之间的矛盾、不注意斯洛伐克人的民族利益、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并非不重要的政治审讯的阴影——的结合导致事件的爆发，并为制定一个改革社会主义社会的完善纲领而进行有系统的工作开辟了道路。纲领的目的是清除过去的变态，实现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解放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理想，目的就是**加强社会主义**。因为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来说，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不断地使人得到更多的自由的一种手段。

如果我们将今天公布的关于审讯的文件，特别是审讯的结论同作出不违法乱纪的保证的建议和从根本上改变左右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政治制度的建议联系起来，同“布拉格之春”的其他文件——行动纲领、党纲和新党章草案、经济改革的原则及其执行计划联系起来，以及同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在实践中所做的一切联系起来，那么，就连持批评态度的观察家们也会清楚，我们谈论的并不是天真的、自发的和即兴式的试验，而相反，是关于建立符合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以及符合当今世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模式的非常重要的试验。

捷共新领导解决平反问题的方式，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解决办法也不相同，其区别在于：没有那种使某些人感到厌烦的傲慢的批评。因为在所有那些地方，至少有一些受审的人在死后或者还活着的时候就得到了平反，回到了公众生活中去（当然，也远不是所有的人），判决被宣布为无效，因为变态的这一段历史似乎作为再也不可能重演的往事而宣告终结。当然，经验证明，如果还仍然保留能进行审讯的一定的机器，并且不做出反对重演过去一切的法律上的、而且还有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保证的话，政治家们的郑重声明和善意的打算对此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见证人，眼见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压制个人自由，限制新闻报道，不准进行讨论，包括对批评现状的政治家进行镇压和控告的新浪潮，说他们都是为外国利益或者外国间谍机构服务的旧病复发了（虽然不是那么剧烈，但同样是严重的）。

可是，正是因为如此，才应该查明二十年来被党的领导集团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的审讯的**全部真相**——包括苏联的参与；所以，这个《报告》不应该发表。这也是军事侵犯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因之一。

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原来是应该于1968年底提交捷共中央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实际上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准备好了作为讨论基础的报告，也准备好了在捷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初稿和相应的决议草案。但在各种借口下不断推迟捷共中央委员会的讨论日期。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比勒尔本人（目前的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还在1968年夏天就通知捷共中央主席团说，报告包括这样令人震惊的事实，这些事实公布出来将会直接强烈地影响和严重地动摇捷共和它的某些重要领导人的

威信。所以，主席团的一部分成员同意延期公布这个报告，况且许多人感到这个报告的内容和结论对自己是一种威胁。所以，让专家们的小组委员会交出了所有的笔记和材料，禁止他们再去看其他文件，并让他们完全保持沉默。在1968年8月之后，虽然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还努力争取将报告提交捷共中央全会，可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使中央委员会通过它。相反，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和讲话初稿以及决议的初稿被归入绝密档案，期望永远也不再公布。以胡萨克博士为首的新领导集团就象以安托宁·诺沃提尼为首的旧领导集团一样，表现出他们同样害怕真理。

1968年捷共中央四月全会为完成党恢复名誉的工作而选出的以杨·皮勒尔为主席的小组委员会在八月入侵以后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该小组至少有一半成员在众所周知的清洗过程中被撤销了党和国家的职务，并被迫完全保持沉默（例如国民议会副主席玛丽亚·米科娃，1969年9月被开除出捷共中央委员会，后来又被取消了议员资格；内务部副部长伊日·里佩尔被撤职并被开除出中央检查和监察委员会；西班牙国际纵队队员、议会安全委员会主席列奥波尔德·霍夫曼被取消资格和被开除出联邦议会主席团；致力于审讯问题的历史学家卡雷尔·卡普兰被开除出中央检查和监察委员会，并对他采取了纪律制裁，使他不能够出版已经准备好的关于这个题目的书籍。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雅·弗里贝尔特与奥·拉科斯尼克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由此可见，在国外的压力下，再一次使真理受压和缄默，将真理锁在保险箱里达十年之久。对真理的压制和捏造是为准备和采取新的非法活动、专横和罪行服务的。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这些仍然忠于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的一月以来政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把向我们党、我国全体人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力量和民主力量揭露这一事实，并通过这样做促使今后不再发生这种大规模的悲剧作为自己的义务。我们是以五十年代的经验为依据的，当时捏造和专横的机器可以到处灵活地转动，是因为当时被判刑的人是孤立的，谁也不去袒护他们，国内和世界上的大部分公众相信了上述的控告和被告的认罪，而许多正直的人们，实在可以说，他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熟读了这些文件以后，就再也不能原谅对事情的无知。每一个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演的什么戏，过去和现在有怎样的背景。所以，对以任何方式重演这一悲剧还保持沉默的每一个人，都是同犯。

我们也是通过公布这些文件来还自己的债：向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党和自己的人民还债，因为我们这些在这个党内工作了几年或几十年的人，全都感到我们应共同承担责任——某些人由于自己的积极参加，某些人因为自己的宽恕，某些人只是由于自己的沉默。因为只辩解说，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了解这一事实，只是盲目地相信了被告的口供、法官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即使这辩解符合事实，也是不够的。正如文件所说，根据某个人所担任的职务和了解真实情况的可能性的差别，所负的责任也有区别，这肯定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当时热烈通过的纽伦堡法庭的判决已经拒绝了这种辩护，即盲目地执行犯罪的命令是减轻罪行的条件。审讯的一个痛苦的教训正是：不加批评地信任和盲目服从，能够给社会主义造成可怕的损失，所以，共产党人的革命职